

蘇聯工人運動史

第三集



第四輯

蘇聯工人運動史（第三集）



王右木



钟善辅
（1900—1952），四川省合川县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爱国民主人士，心连心社社长，西南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长。

钟善辅



程子健



梁华



李叔敬



贺天熙



赵文锦



刘自明

编 印 说 明

本辑汇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都工运史有关人物介绍二十一篇，其中有可歌可泣的烈士和已去世的工运领袖；有健在老同志的回忆。此外，还有几个可供研究鉴戒的反面人物和最初的工运领导人后来的变节者。

这些人物介绍中所涉及的工运史实，我们查找、核对了有关史料，力求作到真实、准确。但由于时间已过去很久和当时革命的绝大多数时期，处于地下环境，文字材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所限，工作中难免有错漏，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给以指正。

在此，对为我们撰写回忆录、提供史稿和史料的同志表示谢意。

成都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成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王石木	邓寿明整理 (1)
钟善辅烈士传略	何四祥整理 (8)
成都工人阶级的好儿子孟本高	式恒、爱和、明泉整理 (18)
四川、成都早期的工运领袖程子健	何盛明整理 (29)
工人阶级的坚强战士梁华	王迪先整理 (42)
林永贤简介	尹世全整理 (55)
李叔敬烈士传略	李景芳、刘友华整理 (57)
回忆贺天熙	曹琳 (65)
赵文锦	刘友华整理 (73)
忆刘自明与启明电厂工人的斗争	昌华、一超、明泉整理 (79)
我的回忆	郑子芳 (88)
参加成都工人运动的前前后后——	
回忆“成都工抗团”	祝子人 (94)
在成都的革命活动	
回忆抗日战争初期的印刷排字工会	刘方敏 (107)
在成都的斗争回忆	王志明 (116)
在成都的斗争——	
回忆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	尤泉 (123)
缅怀成都两年	杨文祥 (135)
成都工作忆略	张家璧 (140)

我的革命道路 陈沛森(146)

刘亚雄 张爱和整理(154)

马云衢 李景芳整理(157)

付双无 李景芳整理(166)

成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王右木

王右木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在四川、成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也是四川早期党团组织奠基人、工人运动的开拓者。

王右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诞生在四川省江油县城关镇（即现在的江油县武都镇）。在家里弟兄间他排行第三，曾取名王丕昌，王燧。他为人爽直，待人和气，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信实业振兴就能救国。一九一三年秋在四川当时的最高学府——通省师范学堂毕业，一九一四年漂洋过海考取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官费生，在这里结识了李大钊同志。留学期间，听过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讲《政治经济学史》，还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政治经济学。同时，其他方面的社会科学书籍也广泛接触。所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既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又接触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理论。一九一八年秋毕业于明治大学。一九一九年春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之后即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和教日语课。

这时，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磅礴于全国。地处西陲的四川，反帝爱国运动也风起云涌，以学生为先导，工人为后盾的群众运动不断兴起，学生和工人并肩战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怒发，打破了四川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沉寂局面。成都工人阶级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了新思想的聘神力量，这就为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〇年夏天，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暑假王右木曾去过上海，返回成都后，他就组织阅读进步刊物

的读书会，不久宣告失败。以后，他又重新物色新的革命分子，一个包括有工人参加的读书会再次建立起来，主要学习日本森户寿男著的克鲁泡特金研究和其它各种新杂志。这年秋末冬初，陈独秀、李达等和胡适、张东荪等进行了社会革命前途大论战。王右木密切地注视着这场大论战，并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比较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最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挽救中华民族的真理。什么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通都没有前途。于是，王右木在一九二一年春，对读书会进行了又一次改组，并定名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扩大读书会的范围。首先把高等师范学校“爱读新书者合而一之”，又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暗中指导”（注①）。在王右木的宣传和影响下，次年夏，成都出现了四川最早的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王右木在《新四川旬刊》停刊周年之际，重新创办了《人声报》。该刊一开始就明确而响亮地提出了要“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布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方法”。对于如何开展劳工运动，《人声报》认为要注意现实，注重策略要和世界劳工运动相结合，既要“注重此地的劳动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又要高瞻远瞩，“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此为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还要“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注：即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创建的共产国际）团体，作一致行动”（注②）。《人声报》的这些指导思想，为当时成都工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还力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也确切地反映了王右木在这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王右木在《人声报》还发表了他的友人、日本革命活动家小川均的《十年后之日本》一文，该文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

历史发展，阶级分化和政治现状，指出：“现在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明明白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现有了明确意志了。他们不是无意识的‘会成什么样子’的要素，完全是成了‘如何去做’的要素了”。王右木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附言说：“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明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之后，而又有明确的意志，读者诸君你说他们会如何去做？可怜中国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人们啊！你们明明白白的看见你们的反对阶级没有？军阀、政客、地主、房主、商店主、工场主，这些都是天天在剥你们的皮，吸你们的血的人呀！你们应该把他们怎样？”（注③）《人声报》以犀利的笔锋，战斗的语言，直指反动政权，因而横遭当局查封。《人声报》是四川成都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刊物，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鲜明的观点和坚定的立场，勇敢顽强的精神，给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夏天，王右木因领导四川学界进行震动全川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而得罪了当权者，解聘了他在高师的职务。王右木这时无心他顾，在他认为是如何更好地组织群众团体，发展工人运动，更有力地和反动派对抗。因此，他不顾盛夏的酷热，专程去上海找党中央，学习《团体组织法》、《劳工运动法》。在上海期间，他见到了不少的革命战友，特别是同上海党组织的阮达时畅谈以后，感到收获不小。（注④）同时，李达和恽代英也曾几次到王右木的住处和他交谈。夏末，王右木携带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的文件回到成都，随即开始了正式扩建团组织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成都的十三名团员聚集在王右木家中，正式成立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王右木因年龄超过团章规定而不能当选为团的干部。但是，他依然义不容辞地挑起指导团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担子。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成立不久，就遵照中央的指示，团的工作应到劳工方面去活动，建立革命的劳工

组织。王右木召集团员认真分析了成都工人阶级的状况，认为只有造币厂和兵工厂可算产业工人组织。但是，这里的军警控制十分严密，还有工头把持，加之工人待遇比其他厂稍好，暂时不易发动；而一般手工业工人比较零星分散，工作既难，影响亦小，只有长机帮工人人数最多，待遇低劣，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过去曾开展过一些小型斗争，因受骗于工党，罢工惨遭失败。团组织的工作就选在这里着手。于是，王右木派团员中有工运经验的钟善辅和刘亚雄负责长机邦的工运工作。自己也毅然取下博士帽、脱掉旧长袍，换上工人服装深入到长机工人中间去，和工人交朋友。他通俗地宣传组织工会的意义，发动工人自己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他明确提出：“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和本阶级的解放，只有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不要依靠他人，也不要幻想现时的政府能帮助你们，因为现时的政府都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注⑤）尽管他平易近人，又善于辞令，但长机邦工人听了他的话后，仍有一部分工人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行动。这是因为前次罢工的失败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同时也提高了工人们的警觉，使他们懂得要和资本家作斗争，一定要团结一心，并且还需要有舍己为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右木深知这种历史的原委，继续组织团员进行耐心地工作。

在艰苦的思想动员工作面前，王右木以他直爽诚恳的态度和热情的谈话，使工人们逐步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几十名苦大仇深的工人结成了知心朋友。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王右木就借成都皇城内的明远学校教室开办夜课学校，吸收团员介绍来的各工邦积极分子参加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王右木为了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借用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拜把”方式，同二十多名单人拜了把（即结为异姓兄弟）。社青团员在工人中的活动，培养了一批觉悟比较高的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王右木又组织团员扩大宣传范围，到工人聚居的主要街道和茶馆、酒

店，宣传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道理。同时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他最早选中了长机邦的青年工人孟本斋，在提高他的革命觉悟后，吸收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于工人的普及教育，成都地方团组织派谢国儒负责，以高师为基地，劳工报名者达三百余人。王右木在这里主讲革命理论一课。还请张良卿给工人教注音字母，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在条件较好的监狱学校、外东农业学校开设平民教育班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分派钟善辅，康明惠前往组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快地促进广大工人接受马列主义。

在成都工人的革命组织较为广泛地发展起来后，王右木为了掌握各处的运动态势，又培养了热心于工人运动的徐云程。此人过去是抬官桥子的，社会关系多，为人也比较正直。王右木对他开诚相见，在帮助他转变思想以后，介绍他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把他培养为王右木沟通各处工人的联络员。而徐云程“每月伙食费六元，由（王）右木于（恽）代英处借来付之”。（注⑥）在王右木的培养和关怀下，徐云程和孟本斋都成为当时成都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屠杀发表宣言。为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成都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读书会员为骨干，发动成都的工人举行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全市性的政治大罢工。在少城公园召开的大会上，钟善辅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吴佩孚镇压与屠杀铁路工人的罪行。介绍了京汉铁路工人团结战斗的盛况，以及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施洋英勇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使在场群众无不愤然落泪。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显示了成都工人的力量。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在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的领导下，召开了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大会，遍街张贴了由王右木

和团员蒋雪邨、彭仕珍，分别写的“唉！劳工不得不做五一运动啊！”和“诅咒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罢！”两种醒目的传单，给死气沉沉的蓉城增添了新的活力。各工界选派代表出席会议，劳动自治会也派代表赴会祝贺。会上散发了由恽代英和蒋雪邨为工人写的《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的传单，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护工人正当利益的四项提案。

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成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王右木辛勤劳动的结果。《川报》称劳工联合会是“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

（注⑦）

在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王右木还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员，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民权运动。陈毅（仲宏）也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四川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这个运动。七月二日，“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在成都东大街公所召开改组代表会议，对以前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和补充新的力量，由陈毅担任会议的文书职务。会议选出了王右木、裴紫瑞为文书股主任，康明惠、钟善铺为庶务股主任，钟协安、孟本善为交际股主任，刘亚雄、罗荣同为宣传股主任，推选钟协安为联席会议主席，刘亚雄为副主席。（注⑧）十月，重庆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表示要和成都的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携手进行”工作，这样就使全川的民权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九二三年秋，王右木赴上海，转广州。回川后，遵照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和四川国民党总支部建立了联系，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年，经过考察的读书会员已发展到九十余人，流动听讲的达百余人。团的支部不仅在十余个学校建立，工界支部也正式成立起来。王右木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团员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秘密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小组，下面又分工人组和学生组。王右木经常到工人组作政治形势报告，组织工人讨论工会活动方面问题。这时，国共

合作已在全国确立，革命高潮正在形成。

正当王右木以全力开展成都革命运动时，四川军阀杨森企图收买王右木而迫使他暂离成都，前往上海。一九二四年秋，王右木不幸遇难于贵州。王右木虽然过早地离开了四川人民，但是，他创建的工人组织和培育的工人运动骨干，却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推动着成都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注：①《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一九二三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③、《人声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

④、⑥、《王右木给中央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梁国龄：《关于四川党组织情况的回忆》见《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⑦《川报》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

⑧《国民公报》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

邓寿明整理

钟善辅烈士传略

(一)

钟善辅，又名钟世民，四川涪陵县人，是四川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1899年出生于涪陵县罗云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钟香池读过蚕丝学校，毕业后由于找不到工作，在家以种田养蚕为业。善辅自幼勤劳奋发，聪颖好学。他一边帮助家里种田，一边在私塾念书识字。1916年，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重庆一家丝厂做学徒，开始了他独立的生活。1918年经大哥钟伯良帮助，离渝赴蓉，报考蚕丝学校未被录取，遂进入成都警监专门学校。他嘲笑这所学校是“不花钱的旅馆”。

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新文化活动在成都普遍开展。一些进步刊物如《星期日》、《新空气》、《四川学生潮》等纷纷创刊，劳工组织也开始建立。身处这一伟大历史变革时代的钟善辅，渴望真理，向往进步，他积极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

(二)

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沉睡在亚洲的东方雄狮，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各地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积极活动。

1919年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王右木从日本留学回到成都，经过筹备组织，于次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善辅

和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在读书会中，他听了王右木主讲的《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主义精髓》等，并认真地攻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等著作。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人小组、办工人夜校的活动。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22年夏，在王右木影响下读书会会员中的一些先进青年，组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组织，钟善辅和廖恩波、童庸生等人，首批加入了团组织。1922年10月15日，社青团成都地方委员会成立，钟善辅被选为候补执委，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22年冬到1923年2月，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在这个期间，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遵照团中央的指示，配合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劳工运动，建立革命的工会组织。团组织深入分析了成都工业状况，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成都人数最多、组织力量较强的长机帮（丝织行业）开展工作。善辅和其他几位团员担任了开展这项工作的任务。此后，他经常出现在长机帮所在的几条主要街道附近的茶馆里，向工友们宣传革命道理。他列举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大量事实，启发工人们的觉悟，鼓舞工人们起来斗争。在开展长机帮工人工作的同时，他还注意在生丝帮、建筑帮以及店员中开展工作。经过善辅和其他团员的共同努力，团组织把这些帮的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了，建立了成都第一批受团组织领导的各行业工会组织。

1923年2月，传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消息，工人们群情激昂，无比愤怒，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团组织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的群众声援大会上，钟善辅不顾反动派的阻扰，身先士卒，登台发表演说。他痛斥反动军阀血腥屠杀铁路工人的罪恶行径；介绍了京汉铁路工人们团结战斗的英勇行动与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宁死不屈、从容就义的

感人事迹。善辅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充满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场的许多人深受感动。目睹这一情景的孟本斋说：“善辅当时硬是说得来怒发冲冠，好象周身都在打颤，说得大家在淌眼泪。”①在这场斗争中，团组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工友，争取了群众，提高了威信，终于成功地把粗丝、牛骨、刺绣等二十几个帮会组织起来，并以长机、牛筠工人为主干，于当年5月1日建立了“成都劳工联合会”。“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成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善辅在斗争中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和信赖，被推选为成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这年秋，中国共产党成都党组织在王右木领导下成立，善辅和一部分经过考验的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光荣战士。

善辅入党后，更加活跃在成都工人运动的政治舞台上。1923年冬至1924年春，他先后成功地领导了生丝工人和长机工人为改善生活提高工资待遇而举行的两次大规模罢工斗争。还和孟本斋一道胜利地领导了长机工人反“朱尺”的斗争。在这几次罢工斗争中，面对复杂的形势，善辅不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意志，还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性和灵活性。说理斗争和罢工示威交错进行，并积极推动“上层”进行工作。这样，一方面迫使反动当局和资方欲兵又止，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工人群众的要求又得到基本满足，从而达到了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目的。事后，他曾说：通过这些斗争，他“初步学会了对敌斗争的艺术”。②在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善辅还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1924年初，他在担任《甲子日刊》的助理编辑（该刊名义上由杨森出钱主办，实际上为我党控制）时，与社长秦正树（即秦伯卿）、主笔王右木等经常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混战，揭露和抨击社会中的一些罪恶现象，颂扬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1924年3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离川赴沪（不久遇

难牺牲），党把领导成都地区革命运动的重担交给廖划平、钟善辅等人。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我党的帮助下，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纲领。一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的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善辅在这一段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群众、团结工友、扩充组织壮大力量的准备工作上。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开枪打死打伤了几十名中国群众，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从上海迅速席卷全国。成都各界五千多人举行了援助“五卅”惨案的大示威游行，并成立了“五卅”惨案国民后援会。由于刘亚雄、钟善辅领导的成都劳工联合会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公推为后援会的负责团体之一。廖恩波担任了后援会主席团的主要领导职务。钟善辅、曹品、袁亚群（女）等主持后援会会务。成都援助“五卅”惨案的革命运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活跃了政治空气，并为以后进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

1925年冬天，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重庆地方委员会十分重视工人运动，委托程秉渊（程子健）组织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在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全省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5年12月，成都利通等八家车行老板，不顾工人死活，擅自提高车租，激起广大人力车工人的强烈反对。党决定派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高思伯等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领导工人们进行斗争。钟善辅等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用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来提高工人斗争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场规模宏大的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开始了。

1926年1月27日，一千多工人聚集在皇城坝，成立了人力车工会，发表宣言，宣布总罢工。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